

# 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談共融

■文／單國璽樞機主教

## 前言

在中西交通史中，從文化、宗教、學術、科技等層面的對話交流來說，利瑪竇（Matteo Ricci 1552-1610）至今是最成功和影響力最深遠的人。唐代敘利亞景教傳教士阿羅本（Alopen）等人雖然興盛一時，但除了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」和一些文物之外，在中國沒有留下任何繼承人和生活的教會團體。元朝方濟會士孟高維諾（Giovanni deMonte Corvino 1247-1328）和他同一修會的弟兄們，在上都（北京）、內蒙、揚州、福建泉州等地建立許多教堂，一時充滿了活力和希望，但是不久便隨著元朝的滅亡而消逝。深入研究這些早期傳教士的失敗，固然有許多原因，但最大的原因應該是缺乏深度的文化對話、交流、共融。

利瑪竇能夠排除萬難，在中國成功地建立了地方教會，並能使他的影響力歷久不衰。究其原因，應該歸功於他深度了解並尊重中華文化，誠心願意和中華文化對話、交談、共融的努力。梵二大公會議（Vatican Council II）為「宗教交談」

（Interreligious Dialogue）指出三項原則：一、彼此尊重；二、互相了解；三、衷誠合作。這三項原則對於文化交談也相當重要。在四百多年之前，利瑪竇實際已了解這些原則；在抵達中國之後，每日都在實行這些原則。我現在簡略地介紹利瑪竇如何實踐這些原則。

## 利瑪竇尊重中國文化

利瑪竇在進入中國之前，他的直屬上司范禮安神父（Alexandro Valignano 1539-1606）便高瞻遠矚地指示他應該學習中文，並尊重中華文化，深入研究探討中國一切正當高尚風俗習慣，只要不相反純正基督信仰的，均可接受。利氏在澳門專心學習中文一年之久，然後小心翼翼地進入廣東的肇慶。在肇慶，他細心觀察當地的風俗習慣。看到當地佛教僧人均剃鬚髮、著僧袍袈裟。他認為自己是出家的傳教士，也應該剃鬚髮、著僧服。過了一段時期，他觀察到：對當時社會有重大影響力的人士，不是僧侶，而是儒家的文人學士。同時，他的好友瞿太素也勸他改著儒服，於是他便蓄髮留鬚、穿上儒士服裝。這樣便更容易和當時的士大夫交往，並且能夠慢慢北上，終於在北京定居，建立教會，使教會在中國扎根，存留至今。

利瑪竇從內心深處尊重中國文化。他給家人朋友所寫的書信中，充滿了對中國文化的讚賞與尊敬和推崇。他給上司所寫的報告中，常從善意、積極方面看待中國文化，很少從消極方面批評中國文化。他既然誠心誠意尊敬中華文化和善良習俗，當然也受到中國人的尊敬與推崇。當時的士大夫都樂於和利氏交往，並尊稱他為「西儒」，更為他起了一個別號「利西泰」，意謂利氏是西方學術界的泰斗。

### 利瑪竇了解中國文化

利瑪竇自動申請到中國傳教時，便充滿了完全奉獻犧牲的熱誠。他渴望效法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。基督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，却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一見如人；他貶抑自己，服從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」（斐理伯書2:6-8）。利氏來到中國之後，不但努力適應當地的氣候、風俗、習慣，學習各地方言和官話（普通話），而且要放棄自己本國的衣食住行習慣；連思想、言談、待人接物的模式，都要徹底仿效中國士大夫的規範。這種脫胎換骨的適應，需要多大的犧牲和奉獻精神。利氏因為渴望將基督的救世福音傳入中國，並願拯救中國人為中國人服務，再大的犧牲，他都願意付出。

福傳的熱忱以及對中國人的無私大愛催迫著他努力研究中國文化。中國當時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思想，一般士大夫將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視為儒家神聖的經典。利氏在肇慶、韶州、南昌、南京、北京等地與士大夫交往頻繁，常乘機和他們討論儒學。在研討儒學時，利氏在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多次發現古代先賢對「天」、「上帝」等觀念非常純真，和《舊約》聖經中所描述的唯一真神天主非常接近；宋明理學家的註釋倒有些偏離了原義。利氏和徐光啓、李之藻、楊廷筠、瞿太素等博學鴻儒論道時，多引用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中有關「天」、「上帝」之觀念，以佐證天主教的信仰，使他們折服，終於受洗入教，成為在中國新生教會的柱石。利瑪竇既然用心研究中國文化，尊重中國文化，努力使福傳工作配合適應中國文化，因此中國士大夫也樂於和利氏交往，研究西學，學習天主教義。在利氏以前的傳教士多望洋興嘆：「岩石啊，岩石啊，你何時為救主打開大門！」利氏以研究、了解、尊重、適應中華文化的萬能鑰匙，終於將明朝閉關自守的銅牆鐵壁打開了。

### 利瑪竇和中西文化的共融

利瑪竇雖然盡心研究中國文化，了解中國文化，尊重中國文化，熱愛中國文化，但是並不盲目地崇拜。他觀察出了中國文化的一些弱點和缺失。明末儒家的主流思想，是以帝王所欽定之宋代周敦頤、程顥及程頤兄弟、及朱熹等理學家的註釋為導向，科舉制度為標竿。宋明理學重視義理的研究，但是，漸漸流於空談而輕忽實踐。利瑪竇所帶來的天文、地理、數學等自然科學雖然引起一些文人學

士的好奇，但是，自大的國人認為中國4000多年傳統的文化及儒家思想，才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，西歐的自然科學只不過是雕蟲小技。

有些重視實踐的文人學士，例如徐光啓、李之藻、楊廷筠、瞿太素等人覺察到利氏所傳授的西方科學，是針對當時儒家崇尚空談義理而缺乏強國富民實際行動的良藥。利氏和這些人志同道合，並得到他們的合作，出版了一些西方科技書籍，例如和徐光啓共同編譯的《幾何原本》，和李之藻共刻的《萬國輿圖》等作品。藉著這些作品，中西文化漸漸融合。

利氏來華的主要目的，是傳揚基督的救世福音。他利用各種機會一點一滴地將福音傳出去。他觀察到中國人很重視友誼，便以耶穌無私大愛、為朋友不怕犧牲自己性命的精神，闡釋友誼，因而著有《交友論》。他認為，士大夫等知識分子是社會柱石，因此特別重視和知識分子交友談道。他把和10位要人談論人生大事，即：人生從何來、死向何往、存在的真正意義等重要問題探討的記錄編輯成書，名為《畸人十篇》。《天學實義》則是利氏一本重要的神學著作，他講論天主的存在、性體、創造宇宙萬物和人類時，除了根據聖經之外，他更旁徵博引，用《五經》及《四書》為證，使文人學士嘆服。這樣也彌補了宋明理學家將古聖先賢對上「天」或「上帝」位格之純真觀念的扭曲，同時也使中西文化之基礎「天人合一」的觀念，得以交流共融。

## 結論

利瑪竇利用中西文化交流共融打開了明代鎖國政策的銅牆鐵壁，做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，同時也將耶穌基督救世的福音傳入中國，建立了在中國的地方教會。他去世時，在中國境內已有2500多位天主教徒，18位耶穌會士中有9位是中國人，可見利氏對培育當地會士之用心。

利氏在華傳教之成功的主要秘訣，是他小心謹慎地研究中國文化，了解中國文化，尊重中國文化而不盲目崇拜。他小心翼翼、謙卑地將當時歐洲的自然科學引進中國，以改革當時士大夫空談義理而不務實際的風氣。他旁徵博引《五經》及《四書》中關於上「天」或「上帝」的觀念，講解天主教的信仰。同時，他也了解自己的宗教信仰，並以生活將之實踐出來。他去世的主要原因，就是不顧自身安危，以純真無私的大愛照顧隻身在北京生重病的李之藻。李氏病癒之後，利瑪竇却因積勞成疾，一病不起。他的死亡給中國地方教會奠定了堅固的基礎。他的却墓雖數度遭受破壞，但他建立的教會卻却屹立不搖。